

淡绿色的 的 站牌

成正和



7.7
3

司



B-2116 成正和 著

淡绿色的站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赠 书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B249014

责任编辑：冉占彩
封面设计：朱成梁

淡绿色的站牌

成正和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图书编辑部编辑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4插页 135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江苏第1次

印数：1——16,000册

统一书号：10355·87

定价：0.1

目 录

真诚的艺术	1
——评成正和的短篇小说	
凌焕新 金国华	
我们都是年轻人	15
篱笆墙	33
笔 祸	47
盼 望	64
顺子和“二号老太”们	85
照 相	97
喜 事	110
第二个回合	120
淡绿色的站牌	131
小 荣	144
第一个印象	152
房 客	161
“回炉烧饼”	180
在江岸镇的茶馆里	192
槐花开了的时候	204

· 凌焕新 金国华 ·

真诚的艺术

——评成正和的短篇小说

文学作品可贵的品格是什么？中外文学家、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清代方东树回答很好：“万古常青，只有一真耳。”艺术作品如果有了真诚的品格，那么它就会如万古不枯的常青树那样，获得永久的生命力。成正和同志长期生活在南京郊区农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作家，辛勤笔耕了将近二十年，在已故著名作家方之等先辈们的熏陶下，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创作道路。一九八一年，他用一副“日日思邻里，笔笔写真情”的春联，迎接着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到来的文艺春天，其实这也可算作是他经过磨炼所确立的创作思想。他想农民、写农民，为农民立言，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原则，因而使他的小说创作

有了较大的突破。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既摆脱了图解农村经济政策、机械配合政治运动的“左”倾思潮的束缚，又摒弃局限于“小鸟的歌唱”那种远离时代漩涡的纯艺术倾向，真实地描绘出当代江南农村变革的一幅幅画卷，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幽默的轻喜剧笔调，艺术地揭示众多青年农民形象的性格美，显示了作者比较深厚的生活底蕴。为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成正和正在以农民纯朴的人格逐步熔铸出作品真诚的文格，表现出农民作家在探索和成长过程中可贵的艺术追求。

独特的题材处理和主题的开掘往往是构成作家艺术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成正和的小说几乎都抒写农村题材，他注意把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勾勒一幅幅江南农村历史变革的速写画，从而形成了他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盼望》这篇小说时间跨度大，通过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苦大仇深的土改积极分子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打击和迫害的悲剧命运史，展现出建国以后农村变化的历史进程和深刻教训。

我们知道，“大跃进”运动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才有定论的，而作者早在七九年就立足今天的现实，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小说中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较为真实的表现，深刻地揭示了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这需要作家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和多么大

的勇气啊!《盼望》在今天看来,艺术上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却不应忽视它是当时勇敢地触及这一领域的少数几篇中较为突出的一篇。在《盼望》中,作者还描述了孟怀富、胡嫂之间爱情的萌生与被毁灭,于他们的爱情遭际中揭露了十年内乱时期极左路线对人们崇高感情的摧残。到小说《篱笆墙》中,这种揭露更为深刻,表达方式也更为巧妙。周老五既当爹,又当娘,终于将栓栓和兰兰拉扯大了,可在颠倒黑白的“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被打成“漏划富农”的阶级敌人,得到的报答竟是儿子和女儿的彻底决裂。读者从周老五一家正常的父子、父女感情被扭曲变形的悲剧中,不也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里被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大悲剧?

如果说前者主要以反思的笔触绘制了农村历史画卷的话,那么,《槐花开了的时候》、《回炉烧饼》等小说则着力于形象地反映粉碎“四人帮”后,江南农村正在进行着现实变革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斗争。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心理上引起了多类型、多层次的变化,他们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广大农村呈现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变革的趋势——成正和的小说给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幅幅农村现实和未来广阔美好的图景。

别林斯基认为:“艺术和一切活的、绝对的事物一样,是从属于历史发展过程的”^①。成正和的小说虽然还构不成“系列小说”,更不是农村历史发展的长轴画卷,但纵观全部作品,不也或一地闪射出时代的折光,呈现出历史发

展的脉络，体现出作者对于当代现实的深厚感情？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主张“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②，因为“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中，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③。细心的读者在看成正和的小说时常会发现：他往往把时代变革和“写我富饶、美丽的家乡村野的景致”^④和谐地结合起来，用写意的笔法，着意勾勒融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于一体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翻开成正和的小说，江南水乡特有的生活气息几乎到处扑面而来。石板桥、芦花河、莲藕塘等风景和坐茶馆、赶集市、闹洞房等风俗民情在他笔下被艺术的金线贯串起来了。读者常因此而陶然流连其中，似有人在画中之感。

成正和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是为地方色彩而地方色彩，将一些画面硬行涂抹到作品中去，而是从总体的艺术构思出发，将风景画、风俗人情画和历史画面融为一体，使思想倾向、故事情节、人物行动和自然画面几方面呈胶着状态，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劳作完结，荷锄而归，这该是一幅多美的江南田园画！但顺子和“二号老太”们之间进步与保守、文明与封建的思想较量却孕育其中；江岸镇上，做买卖的、玩杂耍的，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可在这些热闹哄天的生活里却隐藏着农民旧的艺术习俗；从江南茶馆、开说新书中，透露出新时期农民对艺术的新的需求；芦花河边，芦柴翠生生、清香淡幽幽，而“文革”时代的畸形儿凤萍的虚情假

意、矫揉造作毕现于读者的面前。还有那预示着农村新经济政策将带来沉甸甸的收获的槐叶、槐花，蕴涵着力和智、希望和未来的江南踩藕图……

不难看出，在成正和的小说中，地方特色已非游离于作品有机体之外的点缀，而是作品整体和民族特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融地方特色、时代色彩于一体的速写画，就其内涵而言，往往比某些风景画或单纯的历史画更能表现“时代的生活和情绪”（高尔基语），不但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认识价值。

在人物形象的创造方面，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擅长。成正和以“写我家乡淳朴、勤劳的乡亲”^⑤为己任，把视点投向农民，特别是当代农村青年，抒写他们的性格美，这就构成了他近年来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特点。

如何把握和刻画当代农村青年的性格特征？成正和既看到与他同辈的青年身上传统美德的继承性，又感受到新时代、新思想所灌注给他们的新鲜血液。他发现：与前辈农民相比，当代农村青年依然保持着勤劳、朴实等崇高品质。但他们又不止于此，除了经济状况、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爱情观、理想观和人生观等性格方面已经具备了新的特征，当代农村青年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有了新的意义上的要求。他们既不同于做“三合头瓦房院长者梦”的梁三老汉，亦有别于“蛤蟆滩”的主人梁生宝。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成正和塑造了一组别具个性的当代农村青年的形象，在他们的爱情、追求和奋斗中透现了新型农民的性格美。

爱情观，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物，而是包含着价值观、道德观等多方面具体内容的一种社会观念，从一个人的爱情观，往往可以看出他性格的美丑、灵魂的高下。

《回炉烧饼》描述的是春生和菱妹一对青年人的爱情故事。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不将笔墨滞留于他们如何海誓山盟、永不变心，而是重在探索出怎样的一条纽带把一个俏姑娘和一个“丑八怪”联系在一起，他们特定的爱情基础是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他俩真挚的感情才能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菱妹爱春生厚道、朴实，爱他劳动好。但作为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她选择爱人的标准又有了新的内容，她更要求春生有理想、有抱负。在她看来，小家的发展固然重要，集体的命运更有价值。她对春生的冷热态度完全受制于这一认识，而这种认识也就是她爱情观的主要基础。

与春生、菱妹相比，刘翠莲（《槐花开了的时候》）显然是另一番情景。作者围绕着改嫁这一敏感的事件，在读者面前成功地树起了一个新时代的“李二嫂”的形象。

她，既不同于水晶般单纯的菱妹，亦有别于在逆境中满怀希望的李二嫂。在她的性格中既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的贤慧、温良和勤劳的品质，亦不乏新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在她心目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她的思想性格是二者有机的结合体，反映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就表现为不满于前夫的游手好闲，要求新的对象从事堂堂正正的劳动，创造人世间宝贵的财富。

此外，成正和还将艺术触角伸向人物性格的深层，通过他们的理想观进一步表现当代农村青年性格中的闪光

之处。

梁三老汉是有理想的，他梦寐以求要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梁生宝也是有理想的，他之所以始终坚守在“蛤蟆滩”上向土地私有观念勇敢进击，是为了带领大家走合作化的道路；成正和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农村青年的理想较之前辈则更合理、更壮丽。

如果说对集体前途和命运的关切在菱妹的理想观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在江岸镇的茶馆里》的桂明每次说书前都要加上一段“世界见闻”，则表现出他作为农村的文化新人所具有的新的精神境界。

对桂明来说，并不把说书只当作一种娱乐，他要借此开阔乡亲们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识，把农村和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只要不是带着苛求的眼光来看待桂明这个形象，就会感到：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这个人物的理想中，不但包含了想乡亲们所想的成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当代农村青年渴望接受新的知识，把精神文明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的迫切要求。

如果说从爱情观和理想观的角度，作者已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农村青年性格美的内涵的话，那么在小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中，则又从农村青年的人生观方面对此作了准确而深刻的表现。

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我们都是年轻人》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在刻画了时代的畸形儿凤萍、徐斌灵魂的同时，更用充满激情的笔调，成功地塑造了德元这个鲜明的农村新人的形象，使之作为中国当代农村脊梁的一个代表赫然立于读者面前。他的“新”并非因为性格

上与前辈截然不同(事实上,他的勤劳、朴实和刚强都是父辈们所具有的),而是指他的人生观中投射进了新时代的光束,从而迥异于闰土、阿Q、王老大、李顺大、冯幺爸、陈兔生……

德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的主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让脚下这块大地贡献出更大的光和热量是时代赋予回乡知识青年责无旁贷的重任。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他和伙伴们从事着辛勤的劳作、艰苦的实验……不但有对现实的充分估计,而且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当然,他也发过牢骚,有过埋怨,但更多、更可贵的是切切实实的行动,是“根根肋巴骨出劲地奋斗”。篇末他一气呵成的那封回信,与其说是给凤萍的答复,毋宁说是当代农村主人翁人生观的真实写照,“四化”改革者的壮志篇,字字掷地有声,令人感奋。“艺术的力量就是评价的力量”(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确实,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作者对德元等形象发自真情的肯定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成正和的小说并不停留在对农村青年性格美的简单讴歌上,而是着力刻画出农村青年形象单纯而丰富的性格,较好地处理了性格中主导性与多样性、复杂性的关系。恰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言:“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体”^⑥,成正和在写人物时,并不是“用抽象的方式单把性格的某一方面挑出来,把它标志成为整个人的唯一准绳”^⑦,而是“把他的‘情感和理智的矛盾’对他自己‘和盘托出’”^⑧,力求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

德元这一形象之所以真实可信,强烈地打动人心,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没有把他的性格写成水晶般透明的意念化身,而是遵循“人是一个多方面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⑨的原则,既写他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细菌肥料试制的可贵精神,又写他美好愿望一度幻灭的苦恼;既表现他强烈的自尊心,又刻露他心理角落的自卑感。他很珍惜自己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又曾被人奚落,就是在捉弄徐斌时,他也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其中有蔑视,亦不乏怜悯和同情。

同样,在《回炉烧饼》中,春生的性格也象一个多棱形的柱体,显示出多个不同的面。他曾经血气方刚,准备好好好干一番事业,也曾经为时代的“伤痕”、精神上的创伤而困惑迷惘,因而在集体利益面前陷于畏葸不前的境地。

不过,塑造人物丰富完整的性格,单单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还不够——这只是人物性格统一体的一个“杂多”的方面。只有在写出多样性、复杂性的同时,突出人物的主导性格,使错杂的美和整体的美在人物性格中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进入歌德所说的“单一的杂多”^⑩的奇妙境界,才能保持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完整性,使人物性格成为有机丰富的统一体。

成正和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他笔下德元的性格尽管色彩纷繁,有它的复杂的双重性,然而“‘并不麻木,也没有消沉’,既认准了生活的道路,就‘根根肋巴骨出劲地奋斗’”,这一主导性格却贯穿其性格发展的始终,支配着他的行动。同样,“为集体的前途和自己的幸福而勤于劳作、勇于思索”的精神应该是春生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

因素，他的初试身手、沉沦及东山再起莫不受制于这一性格质的规定性，同时又反过来丰富了性格内涵的容量。

还有必要提出的是，作者在肯定社会矛盾对人物性格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并不忽视其它非基本的、偶然的生活力量的“合力”^⑩的影响（如春生性格中过分执拗的因素等），这就比那些为印证时代的风云变幻而人为设计一些悲欢离合的做法显得高明。这种“合力”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可信性，也使人物的性格美当然地得到较为充分的揭示。

成正和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特点是运用幽默的轻喜剧格调，于笑境中诉诸真情，引导读者透过幽默的外在表现，探究内在的思想容量。

作为美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是“意识对客体，对个别现象和整个世界采取的内庄外谐的态度”^⑪，它带给我们的不是捧腹大笑，而是思索后会意的微笑，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说，“幽默的喜剧，就是轻轻讽刺的喜剧”。

读成正和的小说，我们也常常不由得发出微笑，那么带上了他的艺术标记的幽默该具有哪些特征呢？他又是如何酿成这种笑境的呢？

成正和的“幽默氛围”最显著的特点是寓庄于谐，轻笑中隐藏着庄重的内涵，或昂扬、或苦涩，使读者不满足于普通的笑境，而是笑后反思，思考幽默的美感特征的内核，探求小说严肃的蕴藉，考察作者寄寓的深意。

读过小说《篱笆墙》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其中周老五吃蚕豆的场面。在忍饥挨饿而又和他划清界限的儿

子、女儿面前，周老五“拈起两个蚕豆，撂进嘴里，故意把嘴咂得‘叭叭’响”，继而又感心酸，盛了一钵头送过去，“原来，这么‘革命的儿子’饿极了，也会吃‘搞资本主义的老子’的蚕豆哩！”

虽然小说的基调是悲剧性的，但在这里，作者却调动了他的幽默才能，以喜写悲，“透过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看不见的泪”^⑬。周老五层次分明的心理变化中该包孕着多少丰富的内涵啊！有对儿子、女儿与自己作彻底决裂的痛责，有集严父慈母于一身的阔大胸襟，更有对扭曲了一切，使一切变形的极左路线的嫉恨。

《槐花开了的时候》、《回炉烧饼》等小说也都不同程度地洋溢着幽默的轻喜剧的格调。

归纳起来，造成这种格调的主要方式有：

一、人物性格的表现和他所处的那个环境脱节，产生异乎寻常的不协调，从而导致喜剧性的矛盾。

《我们都是年轻人》中，徐斌向翠香求爱这一飞来之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了解徐斌的人都知道他向来蔑视农民，“落后、贫困、愚昧包围着我，我感到窒息”。因而他向翠香求爱这一举动本身就构成喜剧的矛盾，更何况他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竟采用了选择肉麻的字眼写情书的方式。作者在此并非为幽默而幽默，把喜剧性当作终极目的，而是服从于揭示人物深层心理的需要，落笔虽不多，徐斌内心的空虚、精神的无所依托暴露无遗。

二、人物对自己并无充分的认识，亦未完全理解外界的评价，在表现自己带有缺陷的个性时，一味地偏执和迷信，导致喜剧性的矛盾。

“中革命”牛娃(《槐花开了的时候》)吃惯了大锅饭，常以“我享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正正派派”作为逃避劳动的托辞。可笑的是他在和汪大叔争论时，竟很神气地宣扬起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了：“罗——，‘六十条’上讲，三级核算、队为基础三十年不变！你们胆子倒不小，分什么倒头‘责任田’，我就不要！”更为滑稽的是，他明知自己理亏，却不惜挑灯夜战，给县里写信告汪老头的状。“内在的空虚和无意义以假装有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外表来掩盖自己”(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在这里作者将幽默上的嘲弄和讽刺合流，反映了他盲目地一意孤行、倍受奚落遭遇的必然性。

三、在语言运用上，或将外延较大的动、名词放到特定的小环境中，或通过绰号，或调动富有幽默色彩的歇后语、乡谚等，形成幽默的轻喜剧的格调。

面对“二号老太”们的心思，“顺子积蓄力量开始‘反攻’了，采用了中国各阶层人物都为之胆寒的‘大造舆论’的攻心战术”。“反攻”、“大造舆论”、“攻心战术”等词和词组在此产生了意义上的不和谐，形成了幽默的色彩，足以表明顺子不甘失败、重整旗鼓的斗志。而“‘二号老太’们除了常常给女儿们‘打预防针’，增强她们的‘抵抗力’之外”，又采取了对策，“上班、下班派‘流动哨’，严密注视女儿的动向”。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才会使用的“打预防针”、“抵抗力”、“流动哨”在这里出现了，“二号老太”们被夸张了的如临大敌的神态毕现无余。于此可见渴望恋爱婚姻自由与封建经济门阀观念两种思想激烈斗争之一斑。

成正和给他笔下的人物取的绰号，内涵常常很丰富，能反映人物性格的某些本质。如“二号老太”一方面道出了二芹妈等人的年龄特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她们脑袋中顽固的封建门阀思想。“中革命”呢？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牛娃深受极左路线毒害而不知其害的性格特征。其它如“呆头鹅”、“花轿疯”等绰号也颇为形象，读来饶有趣味。

至于富有幽默色彩的歇后语、乡谚等，在成正和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很好地体现了他讴歌农民的创作主张和民族化的创作特色，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之，成正和是在“美与社会意义相统一”的原则下追求幽默的轻喜剧的格调的。我们在他的幽默里看到的不是庸俗、油滑和绝望，而是智慧、健康和希望。

记得一位评论家曾说过，一个作家的长处往往就是他的短处，他的特点常常也就是他的局限。成正和长期沉于农村生活底层，无疑，他的积累是很厚实的。但有时就因为他和生活拥抱得太紧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以超越周围人的目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评判生活。反映到作品中就表现为生活距离、真实感“近”的方面处理得较好，而思考力、创造的意境“远”的方面则嫌不足。某些小说包孕的思想容量、历史深度还欠缺一些。此外，在表现手法上，作者也有必要在发扬文学民族传统的前提下，适当地、有选择地吸收多样的表现手法，为我所用，以便更好地开掘作品的主题，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我们期待着成正和同志的文学创作在已经迈出坚实